

## 【论 文】

# 论元代的“华化”与民族融合

——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分析中心<sup>1</sup>

李克建<sup>2</sup>

**摘要：**《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艰辛的努力考证了元代色目人（即文中所称“西域人”）之“华化”问题，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元西域人“华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而是西域人主动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认同运动。这场运动背后不仅深藏着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悄然变化和民族融合势不可挡的坚定步伐，而且还暗含着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之间的规律。

**关键词：**《元西域人华化考》；“华化”；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民族融合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作为历史主导力量的朝代。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蒙古统治者君临全国后，将全国各个民族分为四个等级：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元代“民族等级制”。熟悉元史的人知道，“‘色目’是元代对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畏兀儿、回回、钦察、康里等西域人及唐兀人、汪古人的统称，其中以回回人居多。”<sup>[1] (P.540)</sup>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而元代的“南人”中大部分是汉族。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与蒙古、色目人相比，政治上的民族差别极为明显。但是，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大元帝国所体现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民族等级制”。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族，早在入主中原之初就面临着一个以什么方式统治人数众多、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与发达的封建经济的汉族的问题，历史证明，蒙古人和色目人终究没有摆脱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的“永恒的历史规律”<sup>3</sup>。对此，《元西域人华化考》（本文简称《华化考》）<sup>4</sup>作了强有力的论证。这部书堪称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早期的一部学术经典，在20世纪20年代，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艰辛的努力考证元代色目人之“华化”问题，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时至今日，重温经典，这部作品对于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仍然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

## 一、重读《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写作于1923年，全文不过八万字，却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亦成为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可见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多么高远。《华化考》主要阐述了元代西域诸族之人来华后研习汉文化，在文学、美术、建筑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及

<sup>1</sup>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24-28页。

<sup>2</sup>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古代民族思想。

<sup>3</sup>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有类似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sup>4</sup> 本文所用《元西域人华化考》系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所指以及下文所言皆以此版本为准，不再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丰富著述。全书共考证132人，主要是回回人、畏兀儿和唐兀人<sup>1</sup>；所用材料不仅类别丰富而且版本众多，二百二十种材料中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体，此外还兼用了正史、方志、杂记、随笔甚至画旨、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对西域诸族人的族属、年里、著述等作了深入考证。其论证缜密服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sup>2</sup>作者之所以选取西域人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认为在元代被华族同化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中，“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sup>[2] (p.2)</sup>至于“华化”之意义则在于“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sup>[2] (p.3)</sup>，而“忠义、孝友、政治、事功之属，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sup>[2] (p.3)</sup>。《华化考》正文共计八卷，除“绪论”和“结论”外，分设“儒学篇”“佛老篇”“文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和“女学篇”，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的程度可见一斑。

### （一）“儒学篇”

“儒学篇”列于各篇之首，是因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sup>[2] (p.8)</sup>。作者分别以“西域人之儒学”“基督教世家之儒学”“回回教世家之儒学”“佛教世家之儒学”“摩尼教世家之儒学”为线索，深入考证了元时儒学造诣颇深的西域人。在“西域人之儒学”中列举的高智耀、廉希宪、不忽木、巉巉、沙班、泰不华、伯颜师圣、也速答儿赤、丁希元等13人中，廉希宪师从名儒许衡、姚枢辈，可谓“西域人纯为儒者”，在色目人中堪称理学名臣第一人；康里部大人不忽木父子亦师从许衡，崇儒重道，令人惊异；如果说这些人皆为西域人之掌握政权者，那么沙班即为远离政权而注重社会教育者，亦为热心儒学之人；伯颜师圣，学无师承，因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亦为西域理学名儒。陈垣先生除了对这些“普通西域人之儒学”<sup>3</sup>予以详考外，还对“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他教，而改奉儒教或服膺儒教者”<sup>[2] (p.17)</sup>予以考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元西域人华化之深。基督教世家出身的“马氏之儒学，肇自祖常曾祖月合乃，成于祖常父马润，至祖常乃大以肆也”<sup>[2] (p.20)</sup>，可谓西域人华化之典型。马祖常父子弃基督而入儒，且不以夷人身份为讳，还常以夷狄进于中国自慰，其深谙儒家用夏变夷之用心，令人叹服不已！除马氏之外，基督徒高唐王阔里吉思好儒学的程度也可圈可点；回回教世家瞻思丁父子在云南建孔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兴文风之举亦为后人所称道；回回教中著名儒者丁鹤年，精通诗书，著述颇丰；佛教世家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后亦改从儒教，且力言治中国非用儒术不可，可谓深谙儒道；摩尼教世家高昌契氏一门九进士，可见儒学修养之深，其家族“以儒术致通显若此，不可谓非色目人之特色也”<sup>[2] (p.30)</sup>。

### （二）“佛老篇”

陈垣先生在“佛老篇”中阐明，不是所有西域人之佛学都可称为“华化”，只有“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或由晋、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为沙门，仅以性耽禅悦，自附于居士之林”<sup>[2] (p.32)</sup>者，才可谓之“华化”。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双料华化”的概念，即那些先邃于汉学，后又去而谈禅者，以贯云石和丁鹤年为代表。在“西域词人之佛老”中，作者详考了西域著名词人贯云石和迺贤二人；在“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中，经历传奇的丁鹤年成为考证重点，他先由回回教入儒，后又由儒入佛，“其所受中国化之浓厚，又比专门儒者为甚也。”<sup>[2] (p.39)</sup>在“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中，以马祖常之季父马节最为著名，马节之外，家学以儒道杂糅出身的赵世延也值得书写。

<sup>1</sup> 参见邱树森《读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

<sup>2</sup> 具体内容参考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11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元西域人华化考》“前言”第6页。

<sup>3</sup> 所谓“普通西域人之儒学”，即“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何教，未能确指”者。参见《元西域人华化考》第17页的解释。



### （三）“文学篇”

元时华化之西域人，文学成就相当高，精通诗词曲赋者不乏其人。尤其是诗学方面成就颇高，前面所考之人如巉巉、马祖常、泰不华、贯云石、迺贤、丁鹤年等皆有诗名，且多有诗集相传。“西域人中，更有其诗不传，而其诗集序跋尚见于他人文集，可以略窥其造诣者”<sup>[2] (p. 54)</sup>，比如薛昂夫；“又有其诗传者不多，而别以与诗有关系之著述传者”<sup>[2] (p. 55)</sup>，如郝天挺、辛文房；还有“不以诗名，而由赠诗者之众，亦可知其人之风雅”者，如马彦翬、阿里等。在“西域之中国文家”和“西域之中国曲家”中，赵世延、马祖常、贯云石、余阙、瞻思、不忽木等著述颇丰，令人咋舌，可见当时西域人在文学领域有很高的成就，其华化之深，毋庸置疑。

### （四）“美术篇”

元时西域人华学之盛，在书法、绘画、建筑等领域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元人主中国不及百年，色目人醉心华化，日与汉字相接触，耳濡目染，以书名当世者大不乏人。”<sup>[2] (p. 75)</sup>如廉希宪、巉巉、泰不华、贯云石、余阙的书法各有特色，可称美绝；边鲁、高克恭、伯颜不花、萨都刺擅长不同类型的中国画，有的善画花鸟有的善画山水，故宫博物院至今存有萨都刺的画作；元时燕京都城及宫殿，为大食国人也黑迭儿所建，可谓西域人之中国建筑的典范。

### （五）“礼俗篇”

元西域人华化程度之深，在礼俗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人名姓氏、丧葬习俗还是祠祭观念、居处制式皆效华俗。据陈垣先生考证，元时种人皆慕效华风，皆以汉名为荣。廉希宪、郝天挺、高克恭、赵世延、马祖常、颜师圣、丁鹤年等无论矣，是大德八年以前，西域人已多有华名。陈垣以为元时以蒙古名赐汉人，是热中利禄者趋之；而以汉名赠色目人，是醉心文化者赴之。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考元人丧葬习俗之变化，凯霖、丁鹤年当属改从华俗最著者。至于马祖常、余阙等诸多富裕的西域人，其居处制式皆慕效华风，元季士夫风雅相尚，“西域士夫其高致不让华人也。”<sup>[2] (p. 111)</sup>

### （六）“女学篇”

陈垣先生在考证西域人华化情况时，对西域妇女的华化也颇为关注。前面所论西域人华化颇深之人中，其家人也深受华化影响，如赵世延之女、贯云石之女、楔哲笃之妻、丁鹤年之姊、铁铉之女，都是能琴书、善笔札、有学识、能文章之人，她们识汉字学汉文，研习儒家经典，可见“元时华学之广被，且化及西域闺门也”<sup>[2] (p. 115)</sup>。

## 二、从《元西域人华化考》看元代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

重读《华化考》，使我们对陈垣先生的写作意图更为明了，先生在“结论”部分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文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sup>[2] (p. 118-119)</sup>可见先生对元代的文化交融与学术兴盛予以极高的评价，这与先生长期秉持“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sup>1</sup>的民族文化史观密切相关。诚如先生所言，元时西域人的“华化”并非简单的“汉化”，亦非通俗的“同化”，先生“所说的华化或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

<sup>1</sup> 参见袁莹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元西域人华化考〉民族文化史观探究》，《名作欣赏》，2015年第2期。



响、吸收、接受或认同”<sup>1</sup>，是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动与交融、借鉴与吸收、包容与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时西域人的华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而是西域人主动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认同运动，其背后深藏着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悄然变化和民族融合势不可挡的坚定步伐。

### （一）元代儒学发展与传统民族观的变化

说起元代，也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蒙古族的金戈铁马和显赫武功，抑或是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划分和残暴统治，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元代，一个“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sup>2</sup>的元代，一个崇尚理学、文风蔚然、人才辈出的元代，一个文化繁荣、学术昌盛的元代。“元以前西域人仕中国者多武人，以文事著者绝少”<sup>[2](p.4)</sup>，南宋时的安世通和蒲寿晟可谓开有元一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声矣。由于“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sup>[2](p.3)</sup>。西域人“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当在入中原一二世以后，经过长期的文化接触、交流、浸润和交融，西域人对中原文化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因素外，这与元代儒学的发展和传统民族观的变化有极大关系。

金元之际，中原地区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遭到极大摧毁。<sup>[3](p.296)</sup>但是为了巩固政权，蒙古统治者不得不仿效汉法、重用汉人官僚、采纳传统的统治制度实现统治，这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忽必烈之前的蒙古诸汗对待儒学的态度是被动的、怀疑的、保守的，那么忽必烈对待儒士和儒学的态度则是相对主动的、积极的、信任的，因此忽必烈时期，元代儒学尤其是理学在北方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姚大力先生在《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一文中，梳理了1235年到1276年间北方理学的发展状况及特点。由此可知，由于北方地区处于宋、金政权的交替统治中，理学的发展一度停顿，直到1235年宋儒赵复随蒙古军北上，理学才开始恢复发展。赵复、许衡以倡明理学为己任，构建起北方的理学系统，他们亦堪称北方理学大儒。姚大力先生指出：“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的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本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自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这无疑是一种革新精神。理学就是以这种革新精神为指导，融会了佛、道哲学中的养分，从旧儒学体系中演化出来的新学说。比较而言，它无疑要比传统的儒学具有强大得多的生命力。”<sup>[4](p.397)</sup>从这个角度而言，元代歆慕儒学的西域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进入中原，便有机会接触这样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儒学”，从而为其华化注入新的活力。从陈垣先生的考证中我们知道，廉希宪、不忽木、巉巉等西域名儒当时都师从北方理学名家许衡，他们在儒学、诗学、书法、元曲等多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非一般汉族士人所能比，毋庸置疑，其儒学造诣与其师承颇有关联。

如果说理学以传承“道统”而使儒学赋有生命力和活力，那么理学亦以传承“道统”而使传统民族观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为元西域人的华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宋代理学强调“道统”，其思想精髓在于强调文化的本质而不强调文化的传承者是谁；“道统”高于“政统”，这是衡量一切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说，人们判别政权合法性的标准不再看它是华夏主政还是夷狄主政，而看主政者是否传承了儒家文化的“道统”，这从理论上颠覆了春秋以来“不予夷狄之主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实际上，“不予夷狄之主中国”的观念早已在事实上被颠覆。魏晋以来，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大量纷纷内迁并建立政权，如前秦和北魏，都曾统一了北方，事实上的“夷狄之主中国”的局面不容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民族观念。历经魏晋至辽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交替与更迭，传统的“正统”观念和华夷观

<sup>1</sup> 参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前言”第6页。

<sup>2</sup> 参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前言”第3页。



念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元代在对待修辽、金、宋三史“义例”问题上从最初多数人赞成以宋为正统到最后“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sup>[5]</sup>，尤能体现出蒙古统治者民族观的转变。另一方面，元初著名儒士郝经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sup>[6]</sup>的观念，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政权的民族界限，进一步从理论上承认了“夷狄之主中国”的合法性，这也标志着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民族观念正在形成。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叙及宋人家铉翁为元好问诗集《中州集》“题其后”的记载颇能体现这一点：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崇，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暇日获观遗山元子所哀《中州集》，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所为诗，皆采录不遗，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犹吾同国之人，胸怀卓犖，过人远甚，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sup>[7]</sup>

由此可见，无论是元好问对“中州”士人的遴选标准，还是家铉翁对元好问的高度评价，都尽显传统民族观的深刻变化。很明显，“以文化论民族”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观念。陈垣先生也进一步论曰：“此又宋人之先见，而其后竟言中者也。盖铉翁留元十余年，得睹元初人物气象，与宋季之偏激狭隘，迥然不同，知其后必昌，故为是论。岂知不用百载，而西北子弟之成就，已过乎铉翁所期也。”<sup>[2] (p. 121)</sup> 元代西域人华化之显著成效，尽在陈氏之论中！

由此可见，元西域人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华化运动并非特定时代之偶然，而是特定时代之必然。元代空前规模的政治统一局面为各民族的相互往来、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蒙古统治者给予西域人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西域人接触歆慕已久的中华文化敞开了一扇大门；自魏晋以来，随着华夷界限逐渐被打破，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融的机会日益增多，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为汉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子，催生了一种更具生命力和活力的“新文化”，即中华文化，这为西域人学习先进文化提供了更为肥沃的理论土壤。总之，元西域人在华化过程中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一场规模宏大的华化运动不可避免。

## （二）元代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

观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所考之人在儒学、佛教、道教、文学、艺术、礼俗等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西域人在华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主动性、彻底性和坚决性，无论魏晋还是唐室都难以企及。这已不是简单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问题，而是西域人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真实表现。可以说，西域人的这种文化认同心理也深刻地感染着蒙元统治者。以忽必烈为例，尽管他在即位前便广交中原名士，聘问中原名儒，如刘秉忠、姚枢、郝经、许衡、徐世隆、陈庚、李治、赵复等名儒都深得他的信任和重用，他也因积极推行儒学、恢复中原文化而深得中原儒士之心，甚至被中原文坛领袖元好问、李治等人尊称为“儒教大宗师”<sup>[3] (p. 166)</sup>。但是，“中国儒者，其得国主之信用，远不逮西域儒者”<sup>[2] (p. 26)</sup>，因此早在宪宗时期，高智耀便因力言儒者之道而颇得宪宗信任；“当是时，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一西域人儒者之言，不如一西域人释者之言之尤为有力，而得国主之信用也。”<sup>[2] (p. 26)</sup> 佛教世家出身但华化颇深的阿鲁浑萨理亦深得世祖信任。由此可以推断，身居高位的西域儒者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当然，西域人所认同的“中华文化”早已不是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而是杂糅了佛教、道教文化精神，融合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新文化”，它以儒学为主干并“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固然深刻地浸润与影响着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并非一味地接受儒学，而是将其民族文化与儒学融为一体，进而发展了儒学，并扩大了儒学对少数民族的传播。”<sup>[8]</sup> 西域人在华化过程中同样也保留着本民族的诸多特色，包括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在文化交融中都有所体现。元人干文

传对萨都刺《雁门集》的评价如是说：“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启祚，皆始于西北，去周之邠、镐甚远，是以人生其间，多质直端重，才丰而气昌。观之马文清（应作贞）、达兼善、夔子山辈，其所为诗，往往宏伟春容，卓然凌于万物之表，可以轶汉唐而闯风雅，有周忠厚之气象，为之一新。若吾友萨君天锡，亦国之西北人也。君幼岐嶷不群，稍长愈颖敏，为文词雄健倜傥，迥迈乎人人。尝出其所作之诗曰《雁门集》者见示，予得以尽观，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一扫往宋委靡之弊。国家元气，肇自西北，以及于天下，有源而有委，读是诗者尚有以见之。”<sup>[2] (p. 120)</sup>由此可见，西域人“质直端重”的民族性格为元时文风注入了一股清风。这就有如陈寅恪在论及李唐一族之崛起时肯定鲜卑等“塞外精悍之血”的作用，又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赏纳兰容若之“自然”气质。少数民族纯朴、正直、豪迈、豁达的性格特点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朝气和生机，对传统文化起到了“更新”和“净化”的作用。<sup>1</sup>

正如韩震所说，“不同的民族之间只要接触多了，必定有文化融合的结果。”<sup>[9]</sup>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也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华传统民族观历来注重“礼分华夷”的民族区分标准，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亦有其自身规律可循。总体而言，历史上的民族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民族融合程度也有赖于文化融合程度。只要少数民族认可、认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就会取得汉民族对他们的承认和认同，因而历史上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高度重合。<sup>2</sup>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便宣布“建元为中统元年”；在统一全国之际，他又决定“建国号曰大元”，无非是想明确表示蒙古汗国理应继承中华“万世之传”，实现天下一家、中华一体的政治愿望<sup>[10] (p. 230)</sup>。忽必烈这样做，就是想借助文化认同手段取得汉民族的承认和认同，并以此宣示蒙元政权的合法性地位。熟知元史的人知道，元代虽然有民族等级制横亘在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之间，但是蒙汉民族之间、西域人与汉族之间以及其他民族与汉族之间基于文化融合而促成的民族融合同样势不可挡。<sup>3</sup>

#### 参考文献：

- [1] 翁独健，2001，《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陈垣，2008，《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 [3] 赵琦，2004，《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 [4] 姚大力，2011，《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5]（明）权衡编，《庚申外史》//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391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6]（元）郝经，《陵川集·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卷37）》//《四库全书》（第11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7]（元）苏天爵，《元文类（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8] 黄昀，2008，“试论儒学在少数民族文化整合中的变迁”，《民族论坛》2008年第2期。
- [9] 韩震，2010，“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 [10] 张碧波、庄鸿雁，2009，《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sup>1</sup> 参见任嘉禾《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sup>2</sup> 参见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李克建《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南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等相关论文。

<sup>3</sup> 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张碧波、庄鸿雁《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50页。

